

中国社会学历史反思

陈 树 德

中国本无社会学，但按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的解喻，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学术却源远流长。吾师周予同教授就认为中国经学中包容有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个主要部分，《群经概论》指出：“《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思想所在”。

钱穆（宾四）教授对于这个道理则有较为详尽而明确的阐发，他把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称作社会学，而且指出中国最高之社会学是：“一二人之心所向，此即一二人之明德。则天下大群社会之基本，乃在最少数一二人之心上。”不言而喻，钱先生所云“中国最高之社会学”，乃中国社会史也。在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与宗法史密切相联，所以他进而指出：“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①

不过，钱先生只是从宏观背景上解释了中国社会史，论证了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文化模式。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中国社会史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就是：叙述由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的中国各历史阶段的人们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具体进程与特殊规律的历史。与之相应的还有中国社会思想史，它叙述西方社会学未传入中国之前种种有关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的观点、学说、理想。作为近代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以后的社会思想便学科化产生了中国社会学。社会思想与社会学二者承上启下，相资相倚；社会学是从社会思想发展而来，是一种学科化了的社会思想，“直到19世纪初叶，社会思想才开始成为科学化，即变成社会学。”^②“盖社会学成立以后，主要的社会思想，只是社会学理论而已。”^③中国社会学是在引进国外社会学（包括唯物史观）和批判继承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思想史的宝贵遗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理论探索，持之以恒的实地社会调查研究，而获得发展，得到成长的历史。前法国社会学学会主席M·威莱特深明此理：“正是在中国三千年社会思想的丰富传统上，年轻的中国社会学在本世纪通过汲取马列主义学说和欧洲的经验研究方法，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会学。”^④

社会学的引进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

西方社会学之所以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接受，确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需要。严复是首先意识到这种需要的人之一，他系统地把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自然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6、203页。

② 钱穆：《社会思想史》，商务1937年版，第1038页。

③ 钱穆：《社会思想》，商务1947年版，第5页。

④ 胡伟等：《当代法国社会学》，三联1988年版，第3页。

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开创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新阶段。从此以后，中国的知识界才顿开茅塞，西方精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自然首先赢得了维新派的欢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是从严复的译著（影响较大的为进化论和社会学）吸取了不少养料，特别是用进化论的发展观，反对封建顽固派“好古而忽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直接为其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作论证。

与此同时，富有国学根底的章太炎也渐渐把目光投向西学，他不仅译介英国斯宾塞、日本岸本能武太等著名社会学家的著作，而且在《噎书》中收录了占全书篇目四分之一的社会学论文，宣传进化思想；鼓吹“合群”“求群”，呼吁团结求生；倡导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来研究历史，做到“藏往”（历史）和“知来”（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为变革现实服务。

孙中山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也曾受到这种社会学说的影响，确认社会学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的情状、社会的进化和群众结合的现象”，注重“全凭事实”的科学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其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①他鉴于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要均贫富，而是要救穷，因此主张要以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满足人民的需要。足见民生主义的社会思想是孙文学说的基础之一。所谓民生史观，德文译作社会史观（Soziale Deutung der Gteschichte），它直接渊源于美国社会学家莫利斯威廉（Maurice william）的《社会史观》（1921）一书。他同时也受到西方社会学中“社会互助论”的影响，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合作分工与互助成为进步的基础，否认中国存在着贫富对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以至把阶级斗争的历史看成是人类的病理，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生理。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创造了社会学在中国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分子，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追求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催化着社会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等文，阐明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在社会变革、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告诫人们进行一个彻底地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意义。新文化运动鼓吹民主自由，其社会观的理论基础仍然是进化论。但是在中国，民主主义思想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社会学已作为民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在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学对于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作用是显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想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人生之路者不乏其人，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总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②

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思想运动随之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思想潮流。李大钊作为一个革命者兼学者、教授，他学识渊博，涉足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先生为中国之思想系统者。为中国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三方面之实质论理学者，其经济学以马氏哲学组织为议论之中心。其哲学亦以马氏哲学组织为议论之中心。其社会学，以资本社会之理论，与其理法的马克思说，为议论之中

^① 《孙中山选集》，第792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一册，第33页。

心。先生之学说，已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之学之经典矣。”^①从这里可以相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主义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李大钊的社会学思想是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李大钊肯定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循着经济现象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学得到的一个重要法则，而且它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并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具体考察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研究劳动、青年、妇女、人口等社会问题。他认为，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和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就是“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具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②这种社会革命论，与胡适的社会改良论，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李大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石的话，那么，胡适则为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提出了方法论原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等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确实开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先河。他的《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1920）要求人们不要“空口说白话”，而要“注重调查，尊重证据”，力图从“种种的事实”，“具体的问题”出发来寻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对于20—30年代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进而他还肯定了唯物史观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种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③

由此看来，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平行发展的局面。前者以社会改良为职志，后者“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即以社会革命为职志。

稍后，中国社会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那就是经验社会学的引进，社会调查的崛起。这种动向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哲学或心理学色彩逐渐淡化，向着以社会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经验研究的转变。究其原因，从国际上看，20世纪，社会学的中心逐渐由欧洲转移到美国，“在美国，社会学在大学中作为一门特殊的经验学科而设立。正是20世纪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经验主义流派，保证了社会学的蓬勃成长和比欧洲各国更顺利的发展。”^④赴美专攻社会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自然就成了经验社会学的引进者，中国实地社会调查的骨干力量。

事实上，经验研究不仅在美国，随着新实证主义的产生，注重社会事实已成为当代社会学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如陶孟和先生说的：“现代社会学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归纳方法以追溯社会进化的次第，显出进化的线索，指示将来进化的倾向与目的。”^⑤陶先生首先迎接这个社会学的大趋势，20年代率先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并长期主持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工作，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社会调查报告，培养了一批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

① 《李大钊先生评传》，见《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②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③ 《胡适文存》（上），第195页。

④ 《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⑤ 《社会进化史·译者序言》，商务1924年版，第3页。

动此起彼伏，先进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联系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社会学文献。例如：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肖楚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彭湃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机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继承科学和民主的五四精神，从事着“工业救国”、“抗日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一类的工作，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否定。中国社会学界的学者们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情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①他们或从事教学，或从事调查，探寻“中国化的社会学”的道路，旨在认识国情，改造社会，也不失为一种“救国”的途径。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央苏区和解放区的社会调查蓬勃兴起。一部分原先学过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和农村社会调查，完全服从于政治救亡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纯学术的范围。如20年代的科玄论战，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人生观，正是为了指导人们去参与、去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行动，去具体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把这场思想学术论战与阶级政治斗争的关联越发拉近了。”^②前后绵延十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也是如此，“很明显，这场论战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并直接为各自的政治纲领政治斗争服务，显示着极其强烈的党性，然而又仍然能够保持了一定高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③

所谓“学术性和科学性”，主要指这场论战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言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清算了俄国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即按交换的存在和形式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批判了西方社会学者奥本海末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即用社会生产的技术程度、产品交换和分配方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成等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根据，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对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作出了正确说明，从而使历史学和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当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以一切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社会结构，农村社会调查的出发点则是以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陈翰笙同志领导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还付诸实践，他们在20年代后期和整个30年代，在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江南、河北和岭南先后进行了长时期的实地研究，他们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社会结构底本质，对于全国社会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④如果说，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的，那么，陈翰笙则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的。他们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也发挥了积极的政治作用。与同时期农村社会调查中只注意孤立和隔离的具体社会表象，只为了慈善救济、改良

① 《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见《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

②③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64、70页。

④ 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编者按）》，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出版。

农业，“不曾企图了解社会结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而忽视了生产关系。”^①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30—40年代以“社会学”为名而实际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举其要者有：《社会学大纲》（李达）、《社会学讲话》（许德珩）、《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李平心）、《社会学入门》（姜君辰）、《社会学和社会问题》（冯和法）等。这些著作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尽管角度不同，体例各异，深度和广度不一，但同样反映了论者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服从于“救亡”、“革命”的主题，现实目的性（意识形态和政治）异常明确。基于此点，这些著作尽管对于中国革命胜利有着贡献，对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唯心主义本质起了作用，但学术性和科学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不仅社会学如此，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正如李泽厚同志所说：“由于革命战争中意识形态在当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科学，于是科学逐渐成了意识形态的恭顺仆从，甚至有时成为牺牲品的”^②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却在中國大陸停顿了近30年。这是很值得人们进行深刻反思的。

关于中国社会学期和范围的商榷

以上我们就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以后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的回顾，对这一发展历程如何分期，如何确定范围，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论题。因为它不啻是由于一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本身就是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历史一样，都是它的自我认识的主要环节。透彻弄清楚中国社会学的分期和范围，是撰写一部好的中国社会学史的必要前提，又是深刻了解社会学的现状、矛盾和问题的殷鉴。

关于分期问题，早在1930年，中国社会学界青年学者蔡毓骧在《社会学刊》第2卷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一文，把3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分为四个时期：1911年之前为“输入期”，五四运动至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移植期”，1925年至1930年为“萌芽期”，1930年以后则为“建设期”。蔡文的分期紧扣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提出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学的重大影响。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社会学的移植场所在教会学校，所授内容“脱离不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立场”，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学探讨的主旨“全在了解全国工农阶级的生活”，他极为推许陈翰笙同志领导农村调查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同年，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所作的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把中国社会学划分为三大时期，即：萌芽时期（1898—1911），建设时期（1912—1930），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标志着进展时期的开始。孙先生强调，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孙先生同样看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学获得长足进步的巨大推动。前辈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分析和分期方法，自有合理之处，却未免笼统了些，而且1930年以后只是一些前瞻罢了。

近年来，社会学界已经发表了一批对中国社会学反思的文章，有的就涉及到分期问题，如韩明谟同志的文章把中国社会学的上限从1898年向上推前至1891年，下限则载至1985年。这样，中国社会学就有95年的历史了；他认为，这95年的历史可分五个阶段，即：1891—

① 《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新版，第44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6页。

1911年的“发轫期”；1911—1918年的“萌芽期”；1919—1927年的“幼苗期”；1928—1949年的“成长期”；建国以来近36年的“改革期”。^①显然，这种分期脱胎于蔡、孙两位先生，也紧扣着时代大背景，但很难体现出中国社会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所谓历史分期，广义言之，是指对历史的一个通观全局的看法，即把一定民族、国家、地区或整个人类所特有的历史过程形成和发展的各阶段基本内容从本质上确定下来。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历史分期，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科学。而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门分支，以研究和阐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及其学术发展过程为任务的中国社会学史，其分期的唯一依据只能是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各阶段基本内容从本质上确定下来，因此，仅仅紧扣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背景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体现出中国社会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即它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里我们想就中国社会学的分期问题谈两点具体看法。第一，规定上下限的依据究竟是什么？韩文将1891年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上限，主要理由是康有为于是年在长兴学舍讲授群学。这当然是历史事实，尽管记载十分简略。问题在于，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整个思想来考察，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当年康有为所讲的群学不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社会学，而是维新志士们把一鳞半爪的社会学常识和中国传统的群的观念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所谓“新学”而已；这种“新学”离西方社会学原型甚远。真正把西方社会学原原本本介绍给中国人的首推严复，次推章太炎。当1898年严复将他所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中头一、二两章刊登在《国闻报》上的同时，这一年7—9月的《昌言报》也连载了章太炎和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中的若干篇章。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不，绝对不是的。1898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戊戌变法的一年，也是维新运动宣告失败的一年。严、章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旨在为维新运动提供思想武器，向中国人民发出民族危亡的警号，呼吁只有顺应“天演”的规律，厉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获得生存，否则就有被淘汰和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在当时确实有掀天揭地般的影响。据此，我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上限应放在1898年为宜。至于下限，我以为定在1978年为好，这是基于中国社会学从此宣告新生、结束踟躇不前的局面这一认识上的。

第二，分期既要体现时代特征，更要反映出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社会学的引进和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初期是顺应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流，直接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20年代以后虽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并存的局面，学者们的思想信仰不尽相同，认识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各异，但都强调社会学的实用性，注重社会调查；建国后由于取消社会学而出现了近30年这门学科的中断时期。基于中国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这个历史事实，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学应该分为四大时期，即：（一）1898—1911年为西方社会学传入我国之初；（二）1912—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之年）为从社会哲学向社会实地研究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半段以中国知识界饥不择食地吸收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进而开始论战为其主要特征，后半段则以开展社会调查进行实地研究为其主要特征；（三）1931—1949年为“社会学中国化”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主要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阵地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得到迅速发展；（四）建国后至1978年为社会学学科中断时期。我们深信，只有这样来划分中国社会学

^①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赖以生存的条件及其主要特征，也才能深刻揭示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恰如其分的评价其社会价值。

与分期密切相关和同样重要的另一问题是中国社会学范围的界定。早在40年代，孙本文先生《当代中国社会学》规定的是所谓“纯正社会学”的范围，他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排斥于外，30年代，冯和法同志的《社会学与社会问题》一书（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版），“用比较巧妙的方法，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是不同于一些美国回来的有名的社会学家的著作的；所以，在一次召开的社会学会年会上，美国派的有名的社会学家不承认这本书是‘社会学’的”。^①这是阶级的局限和时代使然，但是在今天，如果把中国社会学片面视为“经世文学”、“拯救中国文学”、“建设社会主义之学”一味强调其应用的历史传统^②无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方法。

“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③因此，要认识中国社会学的全貌，确定其范围，就必须将中国社会学置于近代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特别要对准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这个整体。

从世界范围看，18世纪的哲学是批判性与革命性的。那时的理论家业已指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系统性的历史哲学，藉由此种历史哲学，每个时代才能了解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中的地位；藉由它，每个时代才能调整其组织与实践方针，以符合当前进化阶段的需要。足见社会学的实体早已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孕育。到了19世纪，哲学便是创造性与组织性的，1807年圣西门将“实证”一词作为一切现代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公分母”，1838年孔德提出了“社会学”一词，他们的目的是企图将人类行为与人类社会的研究基于跟自然科学同样稳固的立足点上。西方社会学史家公认，后来的斯宾塞、马克思等人的作品皆以此为其共同主题。由此可知，社会学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为背景的，它是19世纪哲学变革的直接产儿。

社会学是西学的重要内容。西学东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发端于元朝，发展于明朝中叶，但那时的所谓西学，主要包括天文历算之学、力艺之学、舆地测绘之学、农田水利之法四类；鸦片战争以后，西洋思潮似山洪爆发般涌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如魏源、徐继畲等逐渐倾向西学，《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的问世便是实例。但是，清朝政府却视西洋思潮为洪水猛兽，深恐会“浸淫于群众头脑”，把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归因于外国人的坚甲利兵，他们以为除此之外洋人并无可取之处，要说学习西方就是制炮造船，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夷务”，也就是后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努力从事的“洋务”。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惨败，知识分子痛定思痛，最后才认识到：“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洋者，以为西人之长，在乎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不过枪炮铁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后，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④从此以后，中国人学习西学，不仅有自然科学，而且渐渐偏重于社会科学了。刚刚开始移译的西方著作，多出自日文

① 《冯和法传略》，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应用的历史传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③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76页。

转译，肤浅而又不充实。严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局面的人，把西方社会科学系统地译介到中国。其中社会学是一个重要门类。

继严复以后，西方社会学的著作就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和借鉴。这些著作按其分类，有普通社会学、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社会思想、社会学史、农村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以及其他社会学研究。其中，纯是移译就达近80种，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自著之作就有近200种。^①在众多的译著者中，有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如严复、章太炎、马君武、马宗荣、孙本文、陶孟和、杨东范、陈长衡、陈达、潘光旦、吴景超、叶绍钧、梁漱溟、周谷城、稽文甫、李安宅、李景汉、费孝通；也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蔡和森、陈翰笙、许德珩、冯和法、张锡昌。他们的译著对中国社会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留下了宝贵财富，从中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社会学的大致范围。

当然，中国社会学的范围主要是由其对象决定的，范围只是对象的具体体现。那么，中国社会学的对象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这当然是中国社会。然而，此说未免失之空泛。这里还是让我们举出中国社会学史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提法。

第一种是欧美社会学者的看法。曾赴欧美学习社会学的学者在社会学的性质及其研究对象上尽管看法不完全相同，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是采纳孔德所规定的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的。吴景超说：“社会学的中心问题，至今还是如孔德所指示的，便是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

“社会组织，至少要包括三方面的研究。第一方面是制度的研究，目的在寻求各种制度的关系，如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家庭与宗教的关系等等。第二方面是社区的研究，目的在寻求乡村与都市各种社区的性质及其相互的关系。第三方面便是阶级的研究。”“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变迁，最后的目标，还是发现社会演化的阶段，以及演化的原因。”^②

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陈翰笙虽然也在欧美留过学，但他倾向马克思主义，同时长期从事中国农村研究。他认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因此，“社会学的主要工作，在使现时的社会实质抵于科学的认识，而解释其进展的路向，不忘其一切历史的和经济的意义；分析人类的相互关系，而明了某种社会条件下的集团意识。”^③

比较上述两种看法，骤看似无不相容的地方，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即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划出经济领域来，又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正是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分水岭。

因此，我们研究80年来的中国社会学，首先应该破除“正统”观念，拓展其范围。除了重视研究孔德一系的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外，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此有关的是，对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家及其论著，亦应兼顾到两个方面，并加以比较，对其不同的社会价值历史主义地作出评价。

其次，有些学者虽然不是社会学家，但是他们的著作中却有着社会学中某种相当一般的哲学方针，直接影响着和制约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进程，如胡适的《实验主义》就为中国

① 《中国社会学重要文献分类简表》，载孙本文著《当代中国社会学》（附录），1948年胜利出版公司出版。

②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0—191页。

③ 陈翰笙：《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新版，第43—44页。

资产阶级社会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石，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开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留学期间本来就是“专攻社会学”^①的，后来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论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此外，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均应列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范围。

第三，30年代号称“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虽然也不是社会学家，但他们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于农村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而且有的社会学教授与学生还曾经亲身参加过这个运动，为其顾问或干部，也有的在乡村建设人员训练班上讲授社会学课程。尽管乡村建设派多偏重于农业改良或平民识字教育，不太重视社会学理论，但是为农村社会调查开辟了若干基地，所以，乡村建设的理论（特别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中有许多篇章实质是讲社会学的）与实践同样不能弃之于中国社会学范围之外。

第四，高等院校与科研系统长期从事的社会调查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为中国社会学宝库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品。特别是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那就是应用社会学和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这与五四运动前带有哲学或心理学色彩的中国社会学迥然有别。两种社会调查的目的尽管各异，方法及“理论与应用双方并进的途径”却基本一致，且重点都在农村调查；对于30—40年代的社区调查和解放区调查以及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似可作为重点研究范围。

第五，中国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和演变，能具体反映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辛亥革命前夕至五四运动，中国一些新型的高等学校中虽然开始设置社会学课程，有的还创办了社会学系，但尚处于“教会社会学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学则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社会学系不仅在数量上激增，而且教学内容日趋完善和充实，一些大学还附设社会学研究机构，最著名的有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于20年代设置了社会学组和民族学组，30年代又将原北平社会调查所隶属其下；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机构中也附设有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从中国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和演变中引出一些经验教训来，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可以直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参考。

第六，中国社会学家如何“古为今用”的，也就是说，如何将中国社会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需要出发撰写的中国社会史著作是很多的，例如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等。这些社会学家为什么要涉足于中国社会史的领域呢？用陈顾远先生的话来回答，那就是社会学研究的那些现象并非是从今日起，是千百年递变的结果，“所以想用社会学研究解决现在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底起源和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

^① 《李大钊先生评传》，见《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①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的近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批评台湾的社会学者“一意慕向西化，治社会学，则必以西方社会学为蓝本”，强调一定要结合“中国的社会状态”，而所谓“中国的社会状态”就包括了中国社会史。中国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历来重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就是运用中国社会史的资料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范例，解放前吴晗、费孝通诸先生曾在西南联大讲授“社会结构”课程（后辑成《皇权与神权》一书出版），就纯然是属于中国社会史的内容了。

中国大陆取消社会学的反思

以上我们从纵面和横面的不同视角省察了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现在可以就中国大陆取消社会学这个事实略陈己见。

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之所以停顿近30年，就国内原因而言，如上面说过的那是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条件。就国际原因而言，那是学习、仿效苏联教条主义的结果。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取消社会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取代社会学；二是认为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阴暗面。苏联的这种教条主义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对我们有着广泛影响，解放后我们更是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在各个领域照搬苏联的一套。我们取消社会学，就是这种“照搬”的结果。

1956年，苏联理论界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对教条主义的束缚极为不满；资本主义世界逐步转入暂时稳定时期，在我们国内，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社会学性质的文献，明确指出新中国在解决社会制度以后依然存在着社会问题，又鉴于苏联正着手恢复社会学研究，这自然引起原先从事过社会学教研工作的同志的关注。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教授在政协会议上，在京沪报纸上，分别发表了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意见。所谓“恢复社会学”，当然不是恢复解放前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他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有它自己的社会学。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建立这个新的社会学。”“新社会学的内容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和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从而累积对这方面的知识把它系统化，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②这种意见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学术与政治界限被混淆，关于恢复社会学的建议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康生则火上加油，在北京对外地来京的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给社会学及社会学学者定下了许多罪行：

一、“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作用，是散布改良主义，缓和阶级斗争，为帝国主义培养走狗。”

二、“在中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大概有两个作用：在国内，他们通过农村调查，了解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活动，防止和阻止农民运动，保护地主阶级；通过工厂调查，了解共产党在城市中的活动，保护资产阶级；通过少数民族调查，宣传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挑拨分裂少数民族，便于统治阶级压迫他们。中国很多的社会学家，都与国民党的

^① 《中国古代婚姻史》（序言），商务《万有文库》本。

^② 费孝通在《新建设》编辑部就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社会部有关系，甚至就在社会部工作……（社会部）实际上是个侦探部，专门破坏革命。所以中国的社会学家们改良主义也不多了，他们是要消灭和压迫共产党和革命运动。”

三、“在国外，中国社会学教授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特别是清华这一伙，他们留英留美，回国后作调查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四、“解放以后，取消反动派的社会学是完全对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他们所不满意的”“为恢复社会学的企图，（他们）提出一个总的纲领”“他们这伙人过去是搞社会学的，实际上是借这块牌子贩卖私货的。究竟该叫什么学，他们也说不清楚，我说，那些叫做‘帝国主义侦探学’”。^①

诚然，康生如作为个人讲这番话那是不足为训的，但需知，康生却是代表着一种极“左”的政治思潮，他的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仅为打击迫害一大批知识分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严重的是摧残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给国家和民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尽管在政治上的重重压力之下，即便冒着有被指责为“政治异端”的风险，许多学人仍在求真求实上下功夫。当年哲学界高青海同志提出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组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个观点，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探索，却被扣上“分化论—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又如费孝通的《重访江村》、李景汉的《北京郊区农民家庭生活的今昔》、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本来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品，却被视为“毒草”，成了把他们定为右派的“罪证”。这里有许多教训，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无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学术研究固然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政治不能代替学术，学术如果被框定在固定的政治模式之中，那学术之树必然会枯萎、凋零。这一点对于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国家、民族，都是应当切记的。

1989年2月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宛丽

· 书讯 ·

《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已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何建章主编，
吴军、朱庆芳副主编，全书37万字。 (张)

^① 引自李剑华《社会学随笔》一文，载《社会学通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内部出版。